

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

普列汉諾夫著

唯 眞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

普列汉諾夫著

唯 眞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一九六四年·北京

Г. В. Плеханов
К ВОПРОСУ О РОЛИ
ЛИЧНОСТИ В ИСТОРИИ

本书原据1941年俄文单行本译出,1949年曾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印成单行本。1961年三联书店出版“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二卷时,曾将本书收入,并由译者根据上述《选集》俄文版作过一些订正。这次排印大十六开本时,译文曾由吴国英、张光璠两同志据俄文版重新作了一次校订,增加了一些注释和人名索引。

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

〔俄〕普列汉诺夫著

唯 真 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號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16}$ • 印张 $4 \frac{1}{4}$ • 字数 43,000

1964年9月北京第1版

1964年9月上海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 3002·121 定價(五)0.40元

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¹

—

已故的卡勃利茨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写了《理性与情感是进步的因素》一文²。在該文中，作者援引斯宾塞的言論，硬說在人类前进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情感，而理性只起着次要的并且完全是从属性的作用。有位“可敬的社会学家”³反駁卡勃利茨时，对这种輕視理性的理論表示了含有譏嘲意味的惊异。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家”为理性作辯护，当然是正确的。但他如果不涉及卡勃利茨所提出的那个問題的实质，而单只指明問題的这种提法本身如何不可以和不容許，那他就較正确得多了。事实上，“因素”論本身就是沒有根据的，因为它随便挑出社会生活中的几个方面来，將它們看作独立的实体，变成是从各个不同方面并以不同的功效引导社会人类走向进步的一种特殊力量。这个理論在卡勃利茨那里所具有的形式，尤其沒有根据，因为他不是把社会人类活动的某些方面，而是把个人意識的不同的領域說成为社会学的特殊的实体。这真是絕頂的抽象；无法再前进一步，因为再进一步就会走进显然妄誕无稽的滑稽可笑的境界。这才是“可敬的社会学家”應該叫卡勃利茨及其讀者們注意的地方。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家”发现卡勃利茨因极力探寻历史上

占統治地位的“因素”而走进了怎样一种抽象的迷宮时，也許会在无意中對因素論本身作出一点批評吧。而这在当时對於我們大家都会是很有益处的。但他却没有胜任。原来他自己也是站在这一理論的观点上，他与卡勃利茨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具有折衷主义的傾向，所以在他看来，一切“因素”都同样重要。后来，在他攻击辯証唯物主义的言論中，他的头脑中的折衷主义本性更是表现得特別明显，竟以为辯証唯物主义是为了經濟“因素”而牺牲其他一切“因素”，并根本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一种学說。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家”連想都没有想到辯証唯物主义和“因素”观是毫不相干的，所以只有完全不能进行邏輯思維的人才會认为辯証唯物主义是替所謂无为主义⁴作辯护的。不过，應該指出，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家”的这种落空絲毫也不新奇：过去有，现在有，并且大概将来很长一个时期也还有許許多多的人会这样落空的……

当唯物主义者还没有制定出对自然和历史的辯証观的时候，早已就有人責备他們傾向于“无为主义”了。我們且不去追溯“往古”，只消提一提英国一位著名学者普利斯特列同普萊士进行的爭論⁵。普萊士在評論普利斯特列的学說时，硬說唯物主义与自由概念不能相容，硬說唯物主义取消了个人的任何独立性。当时普利斯特列曾援引日常經驗来回答过他。他写道：“我不来讲我自己，虽然誰也不能說我是一切动物中最不活动最无生机的

(am not the most torpid and lifeless of all animals); 但我要問問你：你在哪里找得到比必然論的繼承者更富于追求最主要目標的思考力、積極性、力量和堅忍不拔精神的人呢？”^①普里斯特列說這話時，是指宗教民主派，即指當時所謂 christian necessarians [必然主義者基督教派]^②而言。我們不知道這個教派是否真像屬於該派的普里斯特列所認為的那樣積極。但這點並不重要。毫無疑義，唯物主義對人類意志的看法是完全能與最堅毅的實際活動相容的。朗松說道，“所有一切向人類意志提出最大要求的學說，都在原則上認定意志沒有力量，這些學說否認自由而使世界服從宿命論”^③。朗松以為凡屬否認所謂意志自由的觀點都會走到宿命論，這是不正確的；然而這並沒有妨礙他看出一件極其值得注意的歷史事實：其實歷史告訴我們，甚至宿命論也並不總是妨礙堅毅的實際行動，而且相反，在某些時代，宿命論還是這種行動的一種心理上的必要基礎。例如在十七世紀的英國，清教徒比其他一切黨派表現過更大的毅力⁷，又如穆罕默德信徒在

① 見《普萊士博士與普里斯特列博士通信中關於唯物主義學說和哲學必然性的自由討論》(«A Free Discussion of the Doctrines of Materialism and Philosophical Necessity. In 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Dr. Price and Dr. Priestley»), 1778 年倫敦版第 391 頁。——校者注

② 十八世紀的法國人看見唯物主義與宗教信條這樣結合起來，一定會深為驚訝。但在英國卻沒有一個人覺得這種現象奇怪。普里斯特列本人就是一個非常信奉宗教的人。真是各地有各地的風俗。

③ 參閱朗松的《法國文學史》俄譯本，第 1 卷，第 511 頁。

很短一个时期內就征服了从印度起至西班牙止的广大地带。若认为我們只要一确信一系列的事变必然到来，我們就失去了促进或阻挠这些事变到来的任何心理上的可能性，那就大錯特錯了^①。

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我自己的活动是否为必然事变鏈条中必要的一环。如果是的話，那我的犹豫就会更少，我的行动也就会更加坚决。这是毫不足怪的：当我们說某人认为自己的活动是必然事变鏈条中必要的一环的时候，那也就是說缺乏意志自由在他看来是等于完全不能无所作为，这种缺乏意志自由反映在他的意識中就是认为不能不如他所作的那样去作。这便是可以用路德的名言“*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我既站在这个地位上，也就不能不这样作”]来表示的一种心理，由于这种心理，人們就会表现出簡直不可遏止的毅力，作出絕

① 大家知道，依据加尔文学說，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上帝預定了的。*Praedestinationem vocamur aeternum Dei decretum, quo apud se constitutum habuit, quid de unoquoque homine fieri valet.* [“我們所謂的預定，是指上帝永久规定的、上帝对自己规定的、对每个人也发生效力的事情而言。”] (*Institutio*, lib. III, cap. 5. [《訓条》，第3册，第5章])同时，依据这个学說，上帝从他的侍从中挑选出几个人去拯救遭受无理压迫的人民。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个摩西就是这样的人物^②。从一切方面都可看出，克伦威尔也自认为是上帝的这种工具；他始終——并且大概是由于非常誠摯的信念——称自己的行动为上帝意旨的产物。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行动都預先帶着必然性的色彩。但这不仅沒有妨碍他趋向于一胜再胜，并且还使他这种趋向具有了不可遏止的力量。

② 关于摩西拯救以色列人的傳說，詳見《旧約全书》《出埃及記》。——校者注

頂惊人的丰功伟业。哈姆雷特^①根本不懂得这种心理，所以他只能唉声叹气。因此，哈姆雷特也就始終不能容忍那认为自由是已被意識到了的必然性的哲学。費希特說得对：“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哲学”。

二

我国有些人听信了什塔姆列尔的意见，以为西欧有一种社会政治学說似乎含有不可解决的矛盾。我們所指的就是他的关于月蝕的例証。其实这一例証是再无聊沒有了。在月蝕所必需的种种条件中，人的活动無論如何也不包括在內并且也不可能包括在內。单就这点来看，已可知道只有在疯人院里才能产生出一个促进月蝕的政党。然而，即使人的活动也包括在上述条件之中，那末，凡属很想看见月蝕而同时又确信月蝕这种现象不用他們促进也必然会发生的人，也是不会加入月蝕党的。在这种场合，他們的“无为主义”不过是拒絕那种无謂的即无益的行动，而与真正的无为主义毫不相干。为了使月蝕这个例証在我們所探討的场合不再是一种毫无意思的例証，上面提到的那个党就得把这个例証完全改变过来。那时就必须設想月亮是个有意識的东西，它受蝕时在天空中所占的位置是其意志自决的結果，而这个位置不仅使它感到极大的快乐，并且是使它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所

^①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所作的同名剧本(1603年)中的主角，这个人物是內心充滿矛盾、行动迟疑不决的典型。——校者注

绝对必需的，因此它总是力求占据这个位置^①。作了这一切设想以后，应当自问一下：当月亮终于发现原来并不是它的意志，也不是它的“理想”决定它在天空中的运动，反而是它的运动决定它的意志和它的“理想”的时候，它又会作何感想呢？照什塔姆列尔的意见说来，如果月亮不用某种逻辑的矛盾来解脱这种窘境，这种发现就必然使它不能运动了。但是这种假定是毫无根据的。诚然，这样一种发现，也许会成为使月亮心情懊丧，使其精神失调，使其“理想”与机械的现实发生矛盾的一种正式根据。但是我们既已假定“月亮的精神状态”归根到底完全是由它的运动来决定，那末我们也就应当在它的运动中去探求那些使它精神失调的原因。如果我们细心加以观察，那我们也许能看出，当月亮处在远地点时，它是以其意志不自由为憾的，而当它处在近地点时⁸，它却又会觉得这是使它精神爽健的新的正式根据了。也许结果恰巧相反：也许它不是在近地点，而是在远地点能找到使自由与必然互相融洽的办法。但是无论如何，这样互相融洽无疑是完全可能的；对必然性的认识是完全能同最坚毅的实际行动相容的。至少迄今历史上的情形常是如此。

① «C'est comme si l'aiguille aimantée Prenait plaisir de se tourner vers le nord car elle croirait tourner indépendamment de quelque autre cause, ne s'apercevant pas des mouvements insensibles de la matière magnétique», Leibnitz, Théodicée, Lausanne MDCCLX, p. 598. [“这恰好似磁针没有发觉磁性的作用，向北方转动，以为它是按自己的意志作的，根本不依任何原因为转移，并以此而感到快乐一样”。莱布尼茨：《神正论》，1760年洛桑版，第598页。]

否认意志自由的人，往往比自己的所有同代人都有更坚强的意志，并且对于自己意志的要求也最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例子是人所共知的。显然，什塔姆列尔是忘记了这种例子，只有故意不愿意看见历史现实真相的人，才会如什塔姆列尔那样忘记这种例子。例如，我国主观主义者⁹和德国某些庸人就是极不愿意看见历史现实真相的。但庸人和主观主义者并不是人，而是如别林斯基所说的一样，不过是些幻影罢了。

现在我们来仔细看看一个人觉得自己的——过去的、现时的或将来的——行动完全带着必然性色彩的那种场合吧。我们已经知道，在这种场合，一个人既如穆罕默德那样自认是替天行道的使者，或如拿破仑那样自认是不可逃避的天运所选定的人物，或如十九世纪的某些社会活动家那样自认是代表着历史运动的不可遏止的力量的人物，那他就会表现出几乎是自发的意志力量，把各县大大小小的哈姆雷特在他的道路上所筑成的那一切障碍，像疾风扫败叶一般一扫而光^⑩。但这种情形使我们感到兴趣的现在还有另一方面，即如下一方面。当我认为我的意

⑩ 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清楚地证明这种人的情感何等强烈。费拉尔公爵夫人勒奈（路易十二的女儿）在她给自己的教师加尔文的信中写道：“我当然没有忘记你所写给我的那些话：大卫对上帝的敌人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自己也始终不会持另一种态度；要是我知道国王，即我的父亲，王后，即我的母亲，以及我已故的夫君（feu monsieur mon mari）和我所有的儿女是为上帝所摒弃了的话，那我就会对他们怀不共戴天的仇恨，惟愿他们落入地狱”等等。怀有这种情感的人，能够表现出无坚不摧的何等可怕的毅力呵！而这些人都是否认意志自由的哩。

志不自由只是表明我主观上和客观上完全不能不如我所作的那样去作时，当我了解我的这种行动同时也是各种可能的行动中最合我的心愿的行动时，在我的意識中必然性是与自由同一的，自由是与必然性同一的，于是我不自由的意思就只在于我不能违反自由与必然性的同一，不能使二者彼此对立，不能觉到我自己是受必然性所拘束。然而这样的缺乏自由，同时也正是自由的最充分的表现。

齐美尔说过，自由总是指摆脱什么东西而言，自由若不了解为与拘束相反，那自由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当然是这样的。但是，决不能根据这种細微、粗浅的真理来推翻哲学思想所曾作出的一种最卓越的发现，即自由是已被意識到了的必然性这一原理。齐美尔所下的定义太狹隘了：这一定义仅仅是指不受外部拘束的那种自由而言。当所談的只是这样的拘束时，自由与必然性的同一就是可笑已极的了：一个想从你的衣袋中偷去新手帕的小偷遇到你阻止他这样做，而他又还没有什么办法打破你这种抵抗的时候，当然是不能自由偷去你这个手帕的。但是除了这种粗浅的自由概念之外，还有一种比这深刻得无比的自由概念。不能进行哲学思維的人是根本不知道有这种自由概念的，而且能够进行这种思維的人，也只有已經摆脱二元論，并了解主体与客体間根本没有二元論者所設想的那种不可逾越的鴻沟时，才能領会到这种自由概念。

俄国主观主义者用他們的烏托邦理想来同我国資本主义的现实相对立，并且不能超过这种对立一步。主观主义者陷进了二元論的泥潭。那些所謂俄国“学生們”¹¹的理想，其近似資本主义现实的程度是比主观主义者的理想少得不可計量的。虽然如此，这些“学生們”毕竟找到了把理想与现实連接起来的桥梁。“学生們”的见解提升到一元論了。在他們看来，資本主义由于其本身的发展进程而走向它本身的否定，因而走向使他們——俄国“学生們”，并且不只是俄国“学生們”——所怀抱的理想见諸实现。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学生們”也就充当着这种必然性的一种工具，并且他們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因这种地位所造成的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的特性，也不能不充当这种工具。这也是必然性的方面。既然他們的社会地位使他們正是具有这种特性而不是具有別种特性，于是他們也就不仅充当实现必然性的工具，不仅不能不充当这种工具，而且还热情地希望和不能不希望充当这种工具。这就是自由的方面，而这种自由是从必然性中生长起来的，更正确点說，这是与必然性同一的自由，这是变成了自由的必然性^①。这样的自由也是摆脱某种拘

① “Die Notwendigkeit wird nicht dadurch zur Freiheit, dass sie verschwindet, sondern dass nur ihre noch innere Identität manifestiert wird”.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Nürnberg 1816, zweites Buch, S. 281. [“必然性所以变成自由，并不是因为必然性已归于消失，而只是由于它的那暂时还是內在的同一性表现了出来。”黑格尔：《邏輯学》，1816年紐伦堡版，第2册，第281頁。] 12

束的自由；它也是与某种约束对立的：深刻的定义并不推翻粗浅的定义，而是补充它们并把它們包括在自身中。那末，在这种场合，究竟还可談到什么拘束，什么约束呢？显然，这里可以談到的是足以使尚未摆脱二元論的人們的毅力受到阻碍的那种精神上的拘束；可以談到的是不善于在那把理想与现实分隔开来的鴻沟上架起一座桥梁的人們所感到苦恼的约束。当一个人还没有用哲学思想上的英勇努力爭得这种自由时，他还不能完全享有自由，不能不因遇见那种与他对立的外部必然性而在精神上感到可耻的苦痛。可是当他一旦摆脱这种苦恼和可耻的拘束重压，而他的自由活动已成为必然性的自觉和自由表现时，那他就会获得他从来所不知道的一种嶄新的完滿的生命了^①。那时，他就会成为伟大的社会力量，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阻碍他，而且没有什么东西会阻住他如

天雷神电
轰击妖邪……

三

再重复說一遍：对于某种现象的绝对必然性的認識，

^① 这位老黑格尔在另一个地方又卓絕地說过：“Die Freiheit ist dies, Nichts zu wollen als sich”. Werke, B. 12, S. 98.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 [“自由不过是个人的确立而已”，《全集》，第12卷，第98頁。（宗教哲学）]

只会加强同情于此种现象并认为自己是引起此种现象的一份力量的人的毅力。如果这样一个人认识了该现象的必然性以后却竟袖手旁观，那就只是表明他不懂得算术而已。例如，我们假定说某种条件总和 S 具备时，现象 A 就必然要发生。你已经向我证明，这个总和中的一部分已经具备，另一部分到 T 时就会具备的。于是热烈同情于 A 现象的我确信了这点之后，便赞叹道：“妙极了！”说罢便躺下鼾睡起来，一直睡到你所预测的事变到来的那个吉日良辰为止。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就会是如下所述。在你的计算中，在现象 A 发生所必需的条件总和 S 中，本来是把我的活动也包括在内的，——假定这种活动是等于 a 。但因为我不睡去了，于是在 T 时所有促进这一现象到来的条件总和就不会是 S ，而是 $S - a$ ，这当然会使情况有所改变的。也许那时忽然有另一个人来替代我，此人本来也是近于无所作为的，不过幸亏他因看见我消极冷淡得太岂有此理而极感愤慨。在这种情形下，力量 a 就会由力量 b 所替代，而如果 a 等于 b ($a = b$)，那末促进现象 A 到来的条件总和就仍然等于 S ，而现象 A 也终究会在 T 时发生。

但是假如不能认为我的力量是等于零，假如我是个灵巧能干的工作者，假如没有什么人来替代我，那就不会有完整的总和 S ，而现象 A 也就会发生得比我们所预计的迟些，或是不会发生得如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完满，或

是甚至完全不会发生。这是个明如白昼的道理，如果我不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我以为在我背叛以后S仍然是S，那只是因为我不會計算而已。然而是否只有我一个人不会計算呢？你曾向我預言过在T时一定会有总和S，而你却没有料想到我同你談話后就立刻跑去睡覺了；你竟确认我始終是个很好的工作者；你竟把不很可靠的力量看成了很可靠的力量。可见，你也計算得不好。但是，我們就假定你絲毫也沒有弄錯，而是把一切都考慮到了吧。那末你的計算就会是如下所述：你說在T时总和S就会具备的。这个条件总和中包括有一个負数，即我的背叛；同时这中間还包括有一个正数，即意志坚强的人因确信其意向和理想是客观必然性的主观表现而受到的那种鼓舞作用。在这种场合，总和S就会真正在你所預料的那个时刻具备，而现象A也就会发生。这大概是很明白的了。既然这很明白，那末究竟为什么我竟会因想念到现象A的必不可免而感到不安呢？为什么我会觉得这种必然性注定使我无所作为呢？为什么我談論这种必然性时，竟会把最簡單的算术法則忘記了呢？大概是因为我所受的那种教育养成了我这种极想无所作为的癖性，而我同你进行的談話又使我这种劣根性一触即发。不过如此而已。

△对于必然性的認識在这里不过是成了我的精神萎靡不振借以暴露出来的誘因。要把它当作造成我这种頹唐习性的原因是絕對不可能的：原因并不是对于必然性的認

識，而是在于我受到的那种教育。由此可见……由此可见，——算术原来是一門非常可敬和十分有益的科学，它的法則甚至是哲学家先生，甚至特别是哲学家先生不应当忘記的哩。

若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对某种现象的发生不表同情，并設法加以阻撓，那末他对这种现象的必然性的認識，又会怎样影响到他的行为呢？这里的情形就有点不同了。这种認識很可能削弱他的反抗的力量。但是反对某种现象的人要到什么时候才会信服这种现象的必然性呢？这要到促成这种现象的条件已經很多而且很强大的时候。反对这种现象的人們对于这一现象到来的必然性的認識，以及他們的力量的衰落，这都不过是促使該现象发生的种种条件强大有力的表现。这些表现也要算在促使該现象发生的有利条件之中。

然而，并不是所有反对該现象的人都会减弱其进行反抗的努力。其中有些人恰好会因認識到此一现象的必然性而加紧进行反抗，以至于拚命掙扎。在一般历史上，尤其是在俄国历史上有过不少表明这种拚命掙扎的大有教益的例子。这种例子想必讀者自己也能够記憶起来，而无須我們来多費唇舌吧。

說到这里，卡列也夫先生就来打断我們的話，当然，他虽則不贊成我們对于自由与必然性的观点，并且不贊同我們偏袒意志坚强分子的“极端行为”的态度，但他終

究怀着滿意的心情在我們杂志上讀到个人能成为伟大的社会力量这种意見。这位可敬的教授高兴地叫喊道：“我向来都是这样說的呀！”这話倒也不錯。卡列也夫先生以及所有的主观主义者向来都认为个人在历史上有极大的作用。曾經有过一个时期，他們因这样主张而博得一班先进青年方面很大的同情，这班青年极力想从事公益事业的高尚劳作，所以自然极为重視个人首創精神的作用。但是实际上，主观主义者不仅始終沒能解决，甚至沒能正确提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他們把“能批判地思維的个人”的活动跟社会历史运动規律的影响对立了起来，因而創造出了一种似乎新穎的因素論：能批判地思維的个人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一种因素，这个运动本身的規律則是另一种因素。由此就得出了一种极不合理的观念，只有当那些积极的“个人”还专心致志于实际迫切問題，因而无暇研究哲学問題的时候，这种观念才勉强可以使人滿意。而当八十年代到来的沉寂时期已使那些能够思考的人获得一种出乎心愿之外的閑暇功夫来从事哲学思考的时候，于是主观主义者的学說便显得破綻百出，甚至好像阿卡吉·阿卡吉也維奇^①那件鼎鼎大名的外套一样根本破烂了。无论怎样修补也补不成功了，于是能够思考的人就相继抛弃了主观主义这个分明全无根据的学

① 阿卡吉·阿卡吉也維奇是果戈理的小說《外套》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个小官僚的典型。——校者注